

#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宗族慈善及现代思考

许秀文<sup>a,b</sup> 高雅楠<sup>a</sup>

(河北师范大学 a.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b.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 宗族慈善是中国古代社会慈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当时的基层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宗族慈善的思想基础主要是基本贯穿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等核心思想、慈善理念指导和支撑了宗族慈善。即使是在慈善事业大兴勃发的今天,这些理念和宗族慈善方式仍然有着发挥的空间。

**关键词** 儒家 宗族 慈善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972(2018)02-0016-05

DOI:10.13573/j.cnki.sjzxyxb.2018.02.004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明史,慈善是人民众多美德中瑰丽的一部分,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精神和行为遍布于社会历史当中。在中国古代社会,慈善可以大而化之地分为官方慈善和民间慈善两种,基于血缘宗法社会的特点,家族、宗族内的慈善是民间慈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族慈善的思想基础主要是基本贯穿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等核心思想、慈善理念指导和支撑了宗族慈善。

## 一、儒家思想中蕴含的慈善理念

慈善二字合成使用最早见于佛教经典,之前均单独使用,各自表达。许慎《说文解字》释义“慈,爱也”;“善,吉也”。“慈”字以心为底,当为发自内心的品质,“善”字从羊,当有吉祥美好之意,“慈善”即为仁慈、慈爱、善良、美好,这种优秀德行在我国源远流长,与儒家核心思想“仁者爱人”庶几相近,亦可认为慈善是植根于仁爱之树上的花朵,儒家思想正是慈善理念的本根。

### (一)儒家仁爱思想是慈善的理论支撑

儒家思想的内核是“仁”。孔子解释“仁”就是“爱人”,将“仁”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并围绕“爱人”的内涵,构建了儒学的核心思想体系。他强调“孝”“悌”,从家庭伦理出发,联系家国,意图以血缘

宗法为基础建立社会的普遍伦理。孟子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sup>《四卷八》</sup>并且用“仁,人之安宅也”<sup>《四卷七》</sup>说明仁的重要性,是人安身立命处身社会的方式。孟子还将仁爱发展为“仁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sup>《四卷十四》</sup>,把仁爱推广到国家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仁爱理论脱胎于本就善良仁爱的民族,又最长久地教化浸润这个民族的心灵,推动个人和社会常怀悲悯之心、仁爱之情,成为慈善最深层的道德根基,为慈善提供了理论支撑,成就了历代扶危济困、救贫助弱的慈善行为。比之后起的本土宗教道教和后传入中国的佛教,儒家思想无疑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士绅阶层,成为人们从事宗族慈善的重要思想渊源。

### (二)孟子提出的性善论是慈善的心理基础

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他通过“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情境假设,人人“皆有怵惕惻隐之心”的共同心理活动论证了性善论。人生来是性善的,具有仁义礼智“四端”,“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sup>《四卷三》</sup>。这是人类固有的天性,皆是本性使然的选择,不是后天赋予的。这本心纯然的向善选择是慈善的心理基础,在天灾人祸灾荒面前,在鳏寡孤独废疾之畔,不忍人之心、惻隐之心油然而生,成为种种

收稿日期 2018-01-24

作者简介 许秀文(1972-),女,河北玉田人,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社会慈善研究。

善举的心理动因。

(三)儒家“泛爱众”“民胞物与”思想设定了慈善的受众范围

《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意思是要求人们按照血缘亲疏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亲亲”是“仁者爱人”的起点,很多人认为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缺陷,是差等之爱,但事实上整个人类社会都在遵循着这样依血缘远近承担不同责任的原则,本就无可厚非。而且儒家在“亲亲”之外,孔子讲“泛爱众而亲仁”<sup>[2]4</sup>,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sup>[1]卷十三</sup>，“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sup>[1]卷一</sup>,将仁爱对象的范围不断辐射拓展、推而广之,展现出一幅大同的理想图景。宋代理学家张载更提出“民胞物与”思想,发展了“泛爱众”的仁爱理念,将受众扩大到全天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凡天下疲癯残疾,茆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sup>[3]231</sup>“民胞物与”以天下为同胞、为家人,尊高敬长,慈育孤幼,以体恤照顾弱势群体为自己的社会责任,丰富了儒家的慈善理念,这也是历代社会慈善所主张遵循的原则。宗族慈善基本处于依血缘关系“亲亲而仁民”的层次,扶助范围有限但内容较为固定,目的更为明确。

(四)儒家理想人格是慈善士绅的价值追求

在儒家经典《论语》中,“君子”这一词汇出现高达107次之多,无疑是儒家所向往的理想人格的代名词。君子是仁者,是仁义礼智“四德”的拥有者;君子恒存道德之心,不断反躬自省,追求道德的更高境界;君子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sup>[2]83-84</sup>，“己所不欲,勿施于人”<sup>[2]241</sup>;君子是社会风气的引领者,“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sup>[2]180</sup>。君子的德行像风一般吹拂百姓的德行,百姓的德行便像随风倒伏的草一样枝附影从。君子人格也是进行慈善实践的士绅的价值追求。中国的士绅阶层是君子人格的忠实践行者,他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sup>[1]卷十三</sup>；“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sup>[4]320</sup>,充满家国情怀,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人生最高目标,在这远大的抱负中,仁爱、慈善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因而不求索,在善德善行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

(五)儒家历代义利之辨激励了慈善士绅的重义热情

义利之辨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与提倡

“仁”相符合,儒家以“义”为先。孔子推崇义,“君子义以为上”<sup>[2]275</sup>,并将义利之辨应用于区别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sup>[2]47</sup>。孔子重义却也能客观对待人们的逐利行为,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sup>[2]42</sup>,但他也强调,“见利思义,见危授命”<sup>[2]210</sup>,才能成为一个趋于完美的人。孟子在与梁惠王问对时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sup>[1]卷一</sup>荀子的义利观也基本相同:“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sup>[5]卷四</sup>对义利的观点都是重义轻利。西汉大儒董仲舒指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sup>[6]卷九</sup>认为义利辩证共生,不可或缺。南宋大儒朱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sup>[7]卷二四</sup>,他说:“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才说着利,必害于义。圣人做处,只向义边做”<sup>[8]卷五一</sup>，“义之和处便是利”<sup>[8]卷六八</sup>,要求求利不可害义,如果利与义相违背,应当舍利取义。历代义利之辨都为当时社会提供了价值指引,产生了很多具有或义重于利、或义利并重的财富观的善人善举。以明清之际为例,当时商业发达,涌现了很多巨富,而他们“见利思义”,为乡里修桥铺路、施粥救济、援建书院,以义导利,将财富作为实现义的渠道、手段。

## 二、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历代宗族慈善

宗族指同宗同族之人,是以父系血缘为基础形成的有组织、有共同意志的社会群体。宗族成员以血缘为纽带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共同体,宗族成员间的救济、养老、助葬等慈善活动对敦亲睦族、维护基层社会生活稳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经历长期的实践和总结,宗族慈善的实施是有章可循的。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按月次记载了当时家族事务详尽的常规安排,救济赈赡的相关内容顺理成章列于其中,时间、对象、事务、原则均有掌控。三月,“是月也,冬谷或尽,榘麦未熟,乃顺阳布德,振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sup>[9]28</sup>,每年于春耕之前、青黄不接之时按照“自亲者始”的原则,以九族为范围救济穷乏。九月,“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sup>[9]65</sup>;十月,“五谷既登,家储蓄积,乃顺时令,勅丧纪,同宗有贫窶久丧不堪葬者,则纠合众人,共兴举之,以亲疏贫富为差,正心平敛,无相逾越”<sup>[9]68</sup>。每年的九月、十月,宗族内要集中对孤寡老病进行救济,帮扶无力丧葬的贫户完成理丧事宜。救济对象仍然遵循以远近贫富相区分,先近亲后远亲的原则,目的在于内部原则统一,避免不必

要的纷争。历代宗族慈善在史书中都颇有记载,虽内容效果不尽相同,但所遵循的儒家慈善理念是大体一致的。

两汉时期,儒家学说逐渐成为社会主导思想,上层将仁义安民作为重要责任,宗族作为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重要纽带,在慈善救助中体现的也是这样的思想。不论灾荒之年还是日常社会生活,两汉宗族救助已经成为民间慈善的主体,承担着救灾济贫、收埋枯骨、收养孤寡等责任。西汉著名羊倌儿卜式,少年时“以田畜为事。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与弟。式入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买田宅。而弟尽破其产。式辄复分与弟者数矣”<sup>[10]卷五八</sup>。正因有这种重亲轻财的品质,卜式后来才能仗义疏财,献产助边,报效国家,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东汉章帝建初年间,南阳大饥,米价暴涨,“情同朱张”典故的主角、一诺千金的朱晖散财同宗以救饥谨,“(朱)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羸者,乡族皆归焉”<sup>[11]卷四三</sup>。东汉汝南平舆人廖扶,据说擅长推演占卜之术,“逆知岁荒,乃聚谷数千斛,悉用给宗族姻亲,又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sup>[11]卷八二</sup>。南阳人任隗,“所得奉秩,常以赈恤宗族,收养孤寡”<sup>[11]卷二一</sup>。这些宗族救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少损失、敦睦亲族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尽管此时佛道慈善的作用不容小觑,但儒家的忠孝等基本伦理在国家治理、宗族团结中更为必要和深入人心,因而宗族慈善理念仍然以儒家为主,常有宗族乡党聚众结坞以求自守自保的状况,发挥了很重要的基层维稳作用。见于记载的同宗慈善救济也很多。曹魏大臣温恢15岁那年,送父亲遗体回归乡里,当时的家中颇有余财。“恢曰:世方乱安以富为?一朝尽散,振施宗族”,将家财尽数周济给了族中需要帮助的人,“州里高之,比之郇越”<sup>[12]卷一五</sup>。东晋祖逖,“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周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sup>[13]卷六二</sup>。刘宋严世期,家境殷实,乐善好施,除了救济宗族乡里还养老助葬。“同县俞阳妻庄年九十,庄女兰七十,并各老病,单孤无所依,世期衣饴之二十年,死并殡葬。宗亲严弘、乡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并饿死,露骸不收,世期买棺器殡葬,存育孩幼。”<sup>[14]卷九一</sup>。萧梁时,徐勉身居尚书仆射,为清要之职,“虽居显职,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贍亲族之贫乏者”<sup>[15]卷二五</sup>。北魏时,张烈功勋卓著,孝文帝任命其为陵江将军、顺阳太守,后因母亲年老辞官

归家奉养,10多年间,“频遇凶凶,烈为粥以食饥人,蒙济者甚众,乡党以此称之”<sup>[16]卷七六</sup>。尽管此时的宗族救济所惠有限,但得到扶助者勉强可以苟安于乱世,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唐代重视亲族相恤,史书中不乏宗族赈济的记载。唐初名相王珪“少孤且贫,人或馈遗,初无让。及贵,厚报之,虽已亡,必酬贍其家”,因少时受他人恩惠,力所能及后多以仁善待人,对宗族之人也多有照顾,“宗族匮乏,周恤之,薄于自奉”<sup>[17]卷九八</sup>。唐高宗永淳初年,关中大旱,民间饥谨,时任乾封尉的裴守真把所有俸禄拿出来供养亲族,自己过着艰苦的生活,“尽以禄俸供姊及诸甥,身及妻子粗粝不充,初无倦色”<sup>[18]卷一八八</sup>。

宋代重视风俗教化,在帝王诏令中强调贯彻儒家仁政思想,官僚士大夫重整宗族制度,宗族慈善蓬勃发展,作用更加突出。最著名的是范仲淹创设的范氏义庄。范仲淹乐善好施,于宋仁宗年间,“置义庄里中,以贍族人”<sup>[19]卷三—四</sup>。他在平江府购置良田10余顷,设立义庄,将每年“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sup>[20]153</sup>。义庄以同姓宗族成员为施惠对象,内容包括口粮、衣料、嫁娶、丧葬、借居、借贷等几乎所有生活问题,此外还设有义学资助本族贫寒子弟学习,对学业优异而取得功名者多有奖励。范仲淹亲自订立义庄规矩13条以制度永续义庄的经营,并规定从宗族中选择一名子弟负责。其子孙后代又数次续订修订规矩,范氏族人也不断继续捐助,使得范氏义庄虽几经沉浮,但都得以挽回,到清朝宣统年间,仍有田产5300亩,创造了一个慈善奇迹。范氏义庄被很多官员士绅争相效仿,从宋代开始,义庄、义田、义学层出不穷,制度化救济蔚然成风。义庄义学等组织的兴起反映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情怀和慈善理念,他是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代表,知行合一践行着他的人生追求。

明清时期,民间慈善事业空前繁荣,宗族慈善也进一步加强。宗族义庄迅猛发展,名门望族大多有自己宗族的义庄。义庄的族田数量越来越多,救济范围越来越广,规矩制度越来越严密,组织管理越来越完善,每个义庄都有自己的成文规约,较大力度地保障了族人的生存发展,培养出了很多足以为宗族表率优秀子弟。国学大师钱穆幼年家境贫苦,就是靠着义庄的救济入学读书的。此时宗族慈善的局限性仍然在于以血缘亲疏区分救济层次,将救济范围限制



在宗族之内,好在其他民间慈善对此不足有所弥补。

历代宗族慈善活动像流水一样沟通宗族内部成员,富户出资救济贫户,实现社会财产的再分配,带来心理的平衡和生活的稳定,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了宗族的进一步发展。

### 三、现代社会宗族慈善再思考

宗族在中国古代社会作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中间层承载了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但近代以来由于国家社会的重大变化遭到严重批判和打击,碾在了历史的车轮之下,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随着环境的转变在经济发达地区有了某种程度的复兴,但现代宗族与传统宗族的构成、理念和功能已经迥然不同,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衰退。在这种社会现实下夸大宗族慈善的功能、倡导宗族慈善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将宗族慈善的有益部分择选出来应用到现代慈善事业中则是可行有效的。

(一)宗族慈善中承载的儒家理念也是现代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

宗族慈善以仁爱为基,承载着儒家发“不忍人之心”的所有慈善理念,为古代社会慈善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慈善理念的内在追求和价值理想良性地影响着当时的君子士绅和社会生活,使宗族慈善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和稳步向前的发展。两千年渐进的思想浸润会深入人心凝成共识,慈善理念和方式也必然要适应自己的社会文化,才能生根发芽具有接受度,所以,即使是在慈善事业大兴勃发的今天,儒家的“仁爱”“恻隐之心”“民胞物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慈善思想和理念仍然具有发挥的空间,应该成为现代慈善事业最深层的思想文化根基。

(二)宗族慈善中蕴含的家国情怀同样适用于现代慈善事业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与国家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小家”和“大国”同呼吸共命运,家国情怀流淌在每个国人心中。家庭也是中国伦理体系的中心,在“家国同构”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儒家学说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同样源自家庭伦理。由个人组成家庭,家庭构成宗族,然后再到国家,儒家“个人—家庭—宗族—天下”的治世理路适应了这种社会认知,又从社会治理层面巩固了这种认知,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理念在传统社会被广泛认可,视为合情合理。这和现代意义上慈善事业所秉持

的公平、公正、公开、平等、效率等理念有着相当的差异,现代慈善在这样以血缘或地缘为亲疏的社会环境下也难以完全落地,所以应该探索一条适应中国伦理环境的社会慈善模式。以建设具备现代理念的制度慈善为目标,在过程中亦不背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推己及人的传统慈善路径,尊重国人广泛认同的家与国、个人与社会的内在逻辑,但摒弃对慈善对象的差别对待,将其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推进,建设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有序社会慈善。

(三)领导者或慈善家的道德观对现代慈善事业同样至关重要

历史上的宗族慈善都有一个领导者,基本上都是儒家的士人君子,慈善基于他们的道德思想,体现了他们的道德价值观。他们身负儒家学养,仁爱理解更为深刻,有的还有过为官执事的经验,因着学识和经历的优越眼界见识自然优于常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也更为强烈。于是,他们走在了慈善救助的前列,甘愿付出时间、精力和物质去济世救人、抚慰人心,但个体的力量毕竟是单薄的,远不能完成他的道德理想和价值目标。因而,还要建设有组织、有规约、能传承的宗族慈善,把仁爱之心长久有效地化为善举义举,施惠于族人。范仲淹如是,历代主持宗族慈善事务的士人君子亦如是。我国慈善事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虽然制度完善、管理规范是发展目标,但对领导者即顶层设计者的道德观要求也绝对不可轻忽。对他们的道德伦理要求和慈善组织一样,既要注重基于公平公正的规范伦理,也不能将传统慈善所依赖的个人德性弃如敝履,二者对于慈善事业及其领导者而言都应该处于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的地位。领导者是慈善组织的灵魂,以个人德性发起慈善活动,以规范伦理为慈善构造必要而合理的制度。如同古代士人君子的道德观对宗族慈善的影响一样,现代领导者的道德观对于慈善事业同样至关重要。

(四)现代宗族慈善要适应时代变革实现理念和管理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宗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由北而南,复兴程度渐次加强,尤以经济发达地区为甚。但时移世易,现代宗族与传统宗族有了较大的区别,文化意义往往大于政治、经济功能,在宗族慈善方面基本体现为宗族基金会和家族企业慈善。宗族基金会的基本职能是筹集善款用于资助本族教育和

修路架桥等公益建设。家族企业慈善近些年来发展势头迅猛,越来越多地承担社会责任和进行社会慈善。宗族慈善与所处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是现代慈善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目前的发展不管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机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变革,宗族慈善既要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慈善伦理,又要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汲取现代管理方式、规范制度中与宗族管理相契合的先进理念,革除宗族制度旧有的一些弊端,运用适宜的方式建设新式宗族慈善,达到宗族财富和慈善传承的良性互动。

#### 参考文献:

- [1] 万丽华. 孟子[M]. 蓝旭,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2] 张燕婴. 论语[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3] 张载. 王夫之·张子正蒙[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4] 张载. 张载集·张子语录·语录中[M]. 北京:中华书局,1978.
- [5] 王先谦. 荀子[M]. 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6] 董仲舒. 春秋繁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7] 朱熹. 朱子全书·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8] 朱熹. 朱子语类[M].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9] 崔寔. 石声汉. 四民月令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0]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1] 范曄.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2]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3]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4] 沈约.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5] 李延寿. 南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6] 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7]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8]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9] 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0] 向燕南,张越. 劝孝·俗约·范氏义庄规矩[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程铁标)

## Thought of Clan Char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XU Xiu-wen<sup>1,2</sup>, GAO Ya-nan<sup>1</sup>

(1.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2.School of History & Cul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China)

**Abstract** Clan char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ancient social charity, which played a great role in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t that time. Kindheartedness, the core idea of Confucian and other concepts of charity in Confucian, which runs through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guided and supported the clan charity. Even today, these ideas and methods of clan charity can still play some roles.

**Key words** Confucianism; clan; charity